

# 佩特林使团访华问题新探

——基于民族史材料的考证\*

孔 源

**【内容提要】** 1618年到达明朝北京的佩特林是历史上第一位来华俄国使者，也是元朝灭亡后第一位穿行蒙古高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因为相关证据不足，中外学者长期以来普遍怀疑佩特林到达中国的真实性。实际上，从民族史角度出发，佩特林回国后撰写的报告对蒙古各部状况的描写，是符合17世纪早期蒙古高原政治状况的。佩特林报告中关于明朝京城和朝贡制度的细节，也在明代史料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对佩特林来华的可能性不应过分否定。

**【关键词】** 中俄关系 佩特林 万历 明蒙关系 朝贡体系 土默特

**【作者简介】** 孔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秋天，一位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名叫伊万·佩特林的俄国使者到达了明朝京城，并得到了一封来自万历皇帝的“国书”。第二年（1619年），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两份出使中国的报告。这是有据可查的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与中国最早的直接交往材料。但是，这位使者和他的报告在国内外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佩特林流传于世的资料，不过是简短的旅行报告和20世纪之后陆续被发现的一些相关俄文档案，而有关佩特林本人的信息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另外，在佩特林出使中国之后的两百年时间里，出使报告的原始俄文版在俄罗斯本国近乎被束之高阁，其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等译本又因表述不精确和缺乏佐证而遭到西欧学者质疑。长期以来，各国学者普遍都在质疑佩特林报告中具体内容的精确性，甚至质疑报告本身的真实性。

进入当代后，随着苏联学界对历史档案的挖掘，关于佩特林出使一事出现了新的证据。20世纪中期，苏联学者米亚斯尼科夫（Мясников В. С.）和杰米多娃（Демидова Н. Ф.）利用新发现的17世纪俄文档案，证明了报告与使团的确存在过。

---

\* 本文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的资助。

两人根据相关俄文档案的互证性，提出了佩特林到达中国，乃至携回国书的合理性。在1966年，两人合作出版了《最早的在华俄国外交官》（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中译本名为《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2010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但是，米氏等人的研究以俄文史料为基础，其主要参考汉文材料佐证还是间接来自19世纪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第）的文章《大司祭帕拉金关于哥萨克佩特林中国之行的札记》<sup>①</sup>。卡氏的确是较早利用了中方史料来研究佩特林的少数有识之士，但对汉文史料的解读存在一些错误。另外，他的这篇文章在学界整体受重视的程度也有限。由于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佩特林时不够重视使用俄文以外的资料，这使得1966年以后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更大的进步。

当代中国学人对俄人佩特林使明一事则更多地持质疑态度。张星烺在1930年出版的六卷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曾收录了佩特林报告。但在1977年重新修订为四卷本后，佩特林报告的内容就被删去了，至2003年再版时也没有恢复。1986年，中国学者郝镇华完全否定了佩特林到达中国的可能性和所携回国书的真实程度<sup>②</sup>。2001年，张箭认为佩特林可能到达过中国，但没有提供有力证据支持<sup>③</sup>。2013年，阎国栋对有关佩特林（彼特林）的论述持折中态度，认为佩特林使华成行的可能性较大，但携回的“国书”应为伪作<sup>④</sup>。数十年来，在俄国方面的新史料挖掘不够，而中方史料中也难以找到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佩特林使团是否到达明朝在中国历史学界还是一桩悬案。

实际上，从当时明蒙关系的实际状态看，佩特林在1618年经过蒙古高原中西部的和托辉特部与漠南土默特部到达明朝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有些被国内外学者用以质疑的例子本身就是误读，比如，近代英国学者巴德利与一些当代中国学者认为佩特林提到的“曼齐喀图王妃”<sup>⑤</sup>是16世纪河套地区土默特部首领俺

① Кафаров П. И. Заметки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в Китай казака Петлина//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ом IV. Вып. I – IV. СПб. 1892.

② 郝镇华：《两封中国明代皇帝致俄国沙皇国书真伪辨》，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③ 张箭：《明末清初俄使出访中国初探》，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④ 阎国栋：《遥远的记忆与诱人的传闻——17世纪中期前俄国的中国形象》，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3期。

⑤ 文中引用佩特林报告的中译皆以〔俄〕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亚斯尼科夫著、黄玫译的《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为准，相应俄文原文以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М. Наука. 1966. 为准。“曼齐喀图王妃”见于《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48页，俄文1号版本中作 княгиня Манчикатут, 2号版本中作 княгиня Малчикатунь 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С. 44.

答汗的妻子，明蒙关系史上赫赫有名的“忠顺夫人”三娘子。由于三娘子在1618年时已经不在人世，他们便据此论证佩特林的记载不可靠。其实，“曼齐喀图王妃”根本就不是三娘子。又如，佩特林拿到的那份文理不通，又不合规矩的“明神宗国书”，它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给朝贡部落的敕书。另外，在佩特林报告中，还有许多被长期忽视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难以随意编造的细节。总之，倘若结合民族史的路径，对佩特林报告和相关史料重新进行梳理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新的证据去支持佩特林来华的合理性与佩特林报告的可信性。

## 一 关于佩特林穿行蒙古高原的可能性

在一般人的历史印象里，草原民族总是攻伐不断的。只有在蒙元帝国时内亚地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之下，柏朗嘉宾、马可·波罗这些西方人才能成功穿越欧亚大陆到达东方。随着元朝的瓦解，北元余部分崩离析，明蒙之间又攻伐不断，这样的“乱世”下俄国使者是否可能顺利穿过蒙古各部进入中国呢？

日本的蒙古史学者若松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在收入《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的《阿勒坦汗传考证》一文中，若松氏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1616年出使和托辉特部的使者丘緬涅茨和彼得罗夫等人打听到“中国”的消息其实是通使蒙古的汉商。和托辉特部位于阿尔泰山北部，当时部落势力正盛，雄主硕垒乌巴什自称阿勒坦汗，17世纪初期俄国人对他的称呼也是“阿勒坦沙皇”。若松氏指出，给俄国人提供这些情报的中国人，若是明朝人，情报的内容不至于这么贫乏甚至错误<sup>①</sup>。实际上，他们是归化城一带的汉商<sup>②</sup>。若松宽在文中进而猜测，从阿尔泰山到归化城，再到明朝的贸易路线上，和托辉特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若松氏甚至认为佩特林1618年成功进入张家口也有赖于和托辉特人和明朝的互市关系<sup>③</sup>。若松宽后面的猜想可能有过度阐释之嫌，因为在明朝人的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和托辉特部的印记，而且当时和明朝互市关系中最重要部落是归化城的土默特人。但是，若松宽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sup>①</sup> 诸如说中国境内没有大山大河，中国人服饰像布哈拉人，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6页。

<sup>②</sup> 〔日本〕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马大正等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sup>③</sup> 同上，第168~169页。

既然汉商可以成功到达遥远的阿尔泰山北部，那么，俄国使者沿同样的道路南下也不会太过艰险。

佩特林出使的时代，蒙古高原上两大最强势力量，除了前述的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政权”，就是扎萨克图汗部。第一位扎萨克图汗是喀尔喀右翼的贵族素班第，他在1596年塔喇尼河会盟后势力膨胀，自称扎萨克图汗，成为蒙古高原西部崛起的强主<sup>①</sup>。佩特林在报告中介绍从阿尔泰山到土默特的各个蒙古统治者时，只有对“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和“扎萨克图”的称呼是“君王”（царь）<sup>②</sup>，而对其他首领的称呼则是“大公”（князь）<sup>③</sup>。当时硕垒乌巴什和素班第并无矛盾，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行动，佩特林的蒙古之旅是安全的。

有关17世纪初期漠北蒙古人社会生活的遗留性蒙古文文献，规模最大的莫过于1970年肯特省佛塔中发现的桦皮文书。这些文书显示了去远方朝觐或者转生远方的希冀。编号分别为（XBM42）<sup>④</sup>和（XBM45）<sup>⑤</sup>两篇转生发愿文中甚至都出现了“汉地五台山”。当然，在一篇编号为（XBM152）的咒语中也提到了“远离汉人之害”<sup>⑥</sup>。但是，这篇萨满教文本的主旨是家宅平安，而且咒语中的汉人之害和日月之害是并列的。因此，这里所说的汉人之害表达的是对“他者”的抽象敌意，并非特指当时明朝果真能对蒙古高原的西北一隅有什么威胁。从这些民间文书来看，佩特林确实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穿行蒙古高原的。

从大尺度的历史背景来看，17世纪初期的蒙古高原也是少有的平静时代。自16世纪初达延汗重新分封六万户之后，17世纪的蒙古高原内部已经和15世纪之前血腥纷争的状况大相径庭。1618年硕垒乌巴什和素班第生活的年代，卫拉特人与喀尔喀人以及喀尔喀不同部落之间没有太多冲突。后来虽然偶有纷争，但直到1686年枯冷白齐尔会盟上，喀尔喀贵族内部以及卫拉特贵族同喀尔喀贵族之间的矛盾才正式激化，之后不久才会发生噶尔丹东征这样的横扫整个高原的巨大战事。整体来看，根据各方面材料，佩特林在这个和平时代来华的难度可能

① 乌云毕力格：《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3页。

②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М. Наука. 1966. С. 42.

③ Там же. 中译本《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没有翻译出这个区别来。

④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p. 96.

⑤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p. 99.

⑥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2.*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p. 189.

并不是那么巨大。

## 二 关于佩特林时代的土默特及“曼齐喀图”考证

佩特林来华时代的归化城土默特就更是安宁之地了。早在佩特林来华之前，土默特的首领俺答汗及其夫人“三娘子”在隆庆五年（1571年）和明朝已经达成了同好互市的协议，俺答汗还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此事史称隆庆和议。后来明朝榆林一带官兵同鄂尔多斯地区首领卜失兔虽然有过较大规模冲突，但是，归化城一带并未被波及。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卜失兔亦与明朝修复了关系，“率诸酋赴红山、清水、中卫、平虏、扁都诸市”<sup>①</sup>。

处于16~17世纪之交的晚明士人对俺答封贡之后明蒙关系评价也颇高。焦竑《国朝献征录》中《四夷·通贡传》一目中评价封贡之后的宣大边境“东西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sup>②</sup>。当然这里不乏对王崇古的溢美之词，但中西线防御的相对平稳起码也是存在的。《武备志》中称“自俺答款后，塞下稍宁，边臣皆论功受赏”<sup>③</sup>。萧大亨《北虏风俗》也反映了俺答汗崛起后蒙古地区的变化。萧氏称“夫像教之设，肇于西方，流于北土，化悍厉为仁慈，于王化岂曰小补之哉”，“夷俗犷悍，不可化悔久矣。比款贡以来，颇尚佛教”<sup>④</sup>。

《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罗布藏丹津黄金史》等17世纪蒙古文史书记载中，都普遍将达延可汗和俺答汗这对父子作为结束乱世、恢复政教太平的代表人物。《罗布藏丹津黄金史》对俺答汗的评价尤其高，甚至高过同时期地位在其上的扎萨克图图们可汗。书中甚至这样赞美俺答汗：“他承继中断多年的宝贝宗教，他兴建被毁灭的国家。他正像古代的忽必烈·薛禅可汗一样在五色四夷中间美誉流传”<sup>⑤</sup>。佩特林来到土默特的时候，这里早已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佩特林见到的那位“曼齐喀图王妃”自然不会是三娘子，因为三娘子在

① [明]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四“中三边”卜失兔阿不害列传，明万历刻本。

② [明]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百二十“四夷”，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榘曼山馆刻本。

③ [明] 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二十六，明天启刻本。

④ [明] 萧大亨：《北虏风俗》，明万历二十二年自刻本。

⑤ [清] 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色道尔吉译，蒙古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1612年就已经故去了，而且三娘子的各种蒙文名号发音也与此无关<sup>①</sup>。实际上，佩特林来华时遇到的“王妃”，就是三娘子的孙媳妇，那位先嫁把汉那吉，后嫁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最后又嫁三娘子之子不他失礼，在汉文中称“大成比妓”，在蒙古文尊称 *Toytai maig buyan - tu dalai qatun*<sup>②</sup>，清人汉译作“托克对玛齐克布延图达赉哈屯”<sup>③</sup>的女统治者。“曼齐喀图”就是“玛齐克哈屯”。造成卡法罗夫乃至米亚斯尼科夫出现错误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从康熙朝开明史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最终定稿的编纂过程中，《明史》形成了数个版本，中间多出错讹矫饰的缘故。万斯同所撰四百一十六卷版《明史》末卷外藩传，就将三娘子当成忠义夫人，而把大成比妓当成忠顺夫人，把这两个人的封号正好弄颠倒了<sup>④</sup>。或许俄国汉学家读到的明史版本，就是有错误的。因此，既然佩特林提到的“曼齐喀图王妃”（*княгиня Манчикатут*）不是三娘子，那么，从卡法罗夫到米亚斯尼科夫等人对佩特林报告中她的儿子“奥楚台吉”（*Ончун - тайчи*）<sup>⑤</sup>的解释同样是有问题的。卡法罗夫相信此人是扯力克之孙，袭封顺义王的卜石兔，而米亚斯尼科夫则接受了这一说法<sup>⑥</sup>。其实，这里说到同忠义夫人齐名，同居一处的统治者应该是大成比妓的亲生儿子素囊（汉文中或称索囊）。《武备志》中说到，大成比妓与不他失礼所生的儿子素囊又名温布，“不他失里黄台吉，系顺义王俺答第七子，三娘子所生也。生二子，长子啞不害台吉即温布，又名索囊”<sup>⑦</sup>。按照蒙古部落的习惯，素囊作为长子，当有黄台吉称号。《畿辅人物志》刘遵宪传中，记载过“素囊黄台吉恃其部落挟赏侵边”<sup>⑧</sup>。记录俺答汗一生功业的蒙古文叙事长诗《阿勒坦汗传》则将素囊的名号写作（*Ombu qong taii*）<sup>⑨</sup>，发音又和温布黄台吉相合。因此这个（*Ончун - тайчи*）可能就是“温布黄台吉”的不正确转音。据前文所述，在卜石兔袭封顺义王后，素囊升授都督同知，仍然在土默特地区拥有重要权力。大成比妓早在1583年把汉那吉亡故时，就“拥俺

① 三娘子各种蒙汉称号有钟根哈屯、也儿克兔哈屯、达喇博迪松之呼毕勒罕阿尔雅达喇等，参见薄音湖：《蒙古史词典（古代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②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06页。

③ 《蒙古源流》，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清]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十六“外蕃传”，清钞本。

⑤ “奥楚台吉”见《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48页，对应俄文 *Ончун - тайчи* 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С. 43.

⑥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第48页。

⑦ 《武备志》，卷二百六。

⑧ [清]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卷十二，清初刻本。

⑨ 佚名：《阿勒坦汗传（蒙汉合璧）》，珠荣嘎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sup>①</sup>，对三娘子都产生了威胁。以后大成比妓母子和扯力克、卜石兔等后辈顺义王也时有纷争。三娘子于1612年故去后，大成比妓的实力达到巅峰。她审时度势，没有阻拦扯力克长孙卜石兔继任新顺义王，只是向明廷为自己和亲生儿子素囊求封赏。在涂宗浚代上的《请嗣封爵以顺夷情疏》中她向明廷陈情道：“我系先年同夫把汉那吉投降中国首款之人，素囊台吉是我与后夫不他失礼所生之子，即先王俺答嫡孙。今忠顺夫人虽故，我同素囊母子俩，外领东西两哨部落，内守得胜、水泉两处边疆，一遵先王盟约，一报天朝厚恩，不敢变心，恳乞军门转奏万岁爷，怜我母子效劳年久，授我忠义夫人，升素囊都督同知，加尝表里。”<sup>②</sup> 1614年，明朝的确应允了他们母子的请求。在1614年大成比妓被封为忠义夫人后，她事实上成了土默特地区辈分最高的统治者，当佩特林经行归化城一带时，想必她的威名已经达到鼎盛。据《万历武功录》，癸未年四月三十日把汉那吉坠马死时，尚是“妻幼子稚”<sup>③</sup>。此年是公元1583年。假设大成比妓时年20岁，则1618年佩特林前来时也不过55岁而已。

不仅汉文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夫人权势之盛。佩特林在喀山所作的口头汇报中，还补充了在莫斯科所做报告中没有详细说明的重要细节：那就是不仅商旅从归化城进入长城沿线需要这位女统治者的许可和证照才可能通过，而且在张家口等重镇也需要她的书信，贸易沿途都是她的人马护送<sup>④</sup>。这条补述并非是佩特林随意添加，不难看出，此处描述的实际上是明蒙互市中大成比妓对朝贡贸易和敕书的掌控。手握大量敕书的土默特部落对明蒙边境贸易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635年皇太极取消归化城土默特贵族权力为止。

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讨论。我们知道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开发离不开俺答汗，大成比妓身份的合法性毕竟也来自俺答汗家族。但是，佩特林既没有提到他，也没有提到过顺义王封号。或许是因为大成比妓母子同顺义王嫡系后人始终不甚和睦。因此，当来到大成比妓控制的地区时，佩特林很可能已经不会过多地感受到关于俺答汗的社会记忆了。

① 《万历武功录》，卷九“中三边”三娘子列传。

② 〔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九，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③ 《万历武功录》，卷九“中三边”把汉那吉列传。

④ 《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第124页。

### 三 关于佩特林的朝贡之旅

佩特林若想加入朝贡团队,除了可能需要携带物质示好外,礼仪上也需要入乡随俗。当时土默特地区的佛教发展已然处于鼎盛时期,俺答汗后人也普遍以崇佛标榜。这大概就是佩特林报告花费了大量篇幅去描写藏传佛教寺庙和宗教习俗的缘故。西方人通过接受东方宗教习俗得以参与入贡明朝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最著名的莫过于传教士鄂本笃来华。鄂本笃从中亚动身,准备取道塔克拉玛干进入河西走廊前,就煞费苦心装扮了一番“长衣缠头,腰挂弯刀,背负弓与箭筒,蓄须发甚长。衷心虽奉基督,而在途间,人皆以为摩诃末之徒也。”<sup>①</sup>鄂本笃虽然没有成功到达京城,但是他还是越过嘉峪关进到了肃州。

佩特林在土默特地区做了多少功课我们不清楚,但最终土默特人的朝贡队伍应该接纳了他。佩特林对呼和浩特地区寺庙的详细描写,证明他曾经努力学习蒙古人的宗教礼仪,努力学得像一个蒙古人。这些关于藏传佛教景观、仪式和风俗的叙述,如果没有亲身参与过宗教活动的人是很难凭空想象出来的。佩特林说到他进入过有三座女性特征的佛像和八位“少女像”的佛殿<sup>②</sup>,显然这是大召寺供奉三世佛和八大菩萨的大雄宝殿内景描写。佩特林的报告还说到土默特有两位称为呼图克图的宗教首领,寺庙为他们设有法座,汗王都要向其行礼<sup>③</sup>。按照当时历史来看,一位活佛应当是席力图召的席勒图呼图克图一世,据称他曾坐过三世达赖喇嘛的高座,教育过后来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是蒙古地区德高望重的高僧<sup>④</sup>。另一位活佛则应该是《蒙古源流》中提到的“大慈迈答哩”呼图克图。《黄金史纲》中说“迈达哩胡图克图诺们汗禀传达赖喇嘛的谕旨,驻锡于蒙古之地,坐在达赖喇嘛的黄幄之中,进而阐扬宗喀巴的宗教于六大国”<sup>⑤</sup>。他不仅掌管过土默特的宗教事务,到1614年时还受过鄂尔多斯部首领的尊崇供奉<sup>⑥</sup>。《阿勒坦汗传》还提到17世纪初的顺义王扯力克和年迈的三娘子将他接到库库和屯

①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2页。

② 《在华俄国使者(1618~1658)》,第65页。

③ 同上,第66页。

④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329页。

⑤ [清]萨冈彻辰《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⑥ 《蒙古源流研究》,第464页。

(归化城) 供养<sup>①</sup>。两位活佛不仅有崇高的宗教威望，而且同土默特贵族关系密切。佩特林若同他们有所接触，也会有助于打通和土默特贵族的关系。

假如佩特林成功打通了与归化城土默特人的关系，那么，他是否能够顺利到达明朝呢。从万历朝的历史来看，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首先明朝后期的敕书发放数量是惊人的。在隆庆和议前夕，给哈密卫等地少数民族的敕书已经数目飞涨。隆庆三年（1569年），朝廷“命量给土鲁番进贡夷人赏赉有差。先是远夷求索者嘉靖初正奏文二十八道，比至末年遂增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不忍尽绝，故每量给以示羁縻云。”<sup>②</sup> 万历朝《明会典》所记，“隆庆六年贡市夷人一百五十二名。万历元年增至四百五十三名，二年增至五百五十七名。”<sup>③</sup> 《明实录》中记载西域、蒙古和女真各处朝贡使节一次性来京的人数，经常也是相当可观的。如万历元年四月，“宴（赏）女直进贡夷人三百员名”<sup>④</sup>，万历三十年闰二月“宴海西脱伦兀等卫进贡夷人看只木等一百一十一名”<sup>⑤</sup>，万历四十六年十月，朝廷还宴请了“泰宁等卫进贡夷人兀尚歹等一百一十九名”<sup>⑥</sup>。

其次，佩特林来到北京的时间据米亚斯尼科夫考证是9月1日<sup>⑦</sup>，而万历皇帝的生辰是1563年9月4日<sup>⑧</sup>。早在隆庆和议时，王崇古就上奏提出“虏入贡互市宜以春月马弱之时，且及万寿圣节四夷来庭之会”<sup>⑨</sup>，以后皇帝生辰接待贡使前来北京形成了一种定制。从报告来看，佩特林本人可能并不清楚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进入北京，但土默特人的朝贡队伍一定是清楚的。

明朝对少数民族朝贡者的行走路线和驻地等都有明确规定，所以，佩特林大概不可能脱离队伍了解更多情报。他的报告体现了他对长城以内的明朝所见所知都有限，这也成为前辈学者们否认他到过明朝的理由之一。但是，有一条细节恰恰是可以为他来京事实与来京身份提供佐证，那就是他提到北京城水路交通的

① 《阿勒坦汗传（蒙汉合璧）》，第181~182页。

② 《明实录》，穆宗朝卷三十二，隆庆三年五月庚申条。

③ [明]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一百七礼部六十五，明万历内府刻本。

④ 《明实录》，神宗朝卷十二，万历元年四月甲子条。

⑤ 同上，神宗朝卷三百六十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辛丑条。

⑥ 同上，神宗朝卷五百七十五，万历四十六年十月辛未条。

⑦ 《在华俄国使者（1618~1658）》，第21页。

⑧ 据“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裕王第三子生”（《明实录》世宗朝），“以嘉靖癸亥八月十七日酉时生上”（《明实录》神宗朝），可知万历皇帝生日公历时间。

⑨ [明] 徐日久：《五边典则》，卷十旧钞本。

时候,对于玉河(又名御河)有不少描写<sup>①</sup>,对距离长城更近的桑干河以及出京南下必经的卢沟河却一无所知,要知道后两者的知名度是高于玉河的。对于一个从蒙古高原而来的商队成员,这个描述合乎情理,因为明代蒙古人来京所住的就是会同馆,除了高层贵族有可能得见天颜,其他人的活动范围基本就拘于其中。万历朝时,会同馆分南北二处,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整体范围在今天王府井、东交民巷一带。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九月丙辰,命于玉河西隄建房一百五十间,以馆迤北使臣”<sup>②</sup>,可知蒙古使臣居住的应该是此馆。又据《明一统志》,“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sup>③</sup>。《大明官制》说的更加明确,“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四夷馆在东安门外”<sup>④</sup>。清朝人依然记载“玉河,源出县西北玉泉山,汇为西湖,分流由德胜门入皇城内,名北海子,亦名御河……南出正阳门,东南流至通州”<sup>⑤</sup>。玉河流入通州河,便和京杭大运河这条运输动脉连通。加入朝贡队伍的佩特林活动范围拘于会同馆及周边市场,又身处于河岸边,关于水运的所见所闻想必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关中国河运和海运的信息大概也是在这里打听到的。

进入17世纪的明朝刚刚经历了“万历三大征”,虽然在辽东仍然危机隐患重重,但整体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万历武功录》就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了明神宗时期北方边疆如何达成基本安定。冯梦龙在天启四年(1624年)出版的《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开篇就对明神宗在位期间的作为不吝赞词地加以追忆,称“这位天子,聪明神武,德福兼全,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处寇乱……远夷莫不畏服,争来朝贡。真个是:一人有庆民安乐,四海无虞国太平。”<sup>⑥</sup>佩特林到达北京时,抚顺刚刚被努尔哈赤占领,但是明朝的天朝上国式的朝贡体系还在照常运转。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明熹宗才根据毛文龙关于努尔哈赤可能和“西虏”蒙古各部联结,通过潘家口等处偷运武器的奏报,方下令严查“进贡夷人”中是否有奸细,指示九边守将“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出入进贡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

① 《在华俄国使者(1618~1658)》译为“游河”,见第56~57页、第70页。俄文作 Юхо,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С. 53.

② 《明实录》,英宗朝卷八十三,正统六年九月丙辰条。

③ [明]李贤:《明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大明官制·卷一》,明万历刻皇明制书本。

⑤ [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一,清嘉庆八年刻本。

⑥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明天启四年刻本。

形。”<sup>①</sup> 在佩特林来华之时，形势还没有这么紧张。

#### 四 关于“国书”的真相以及明人对佩特林的态度问题

被史学家们质疑最多的，就是佩特林收到的那份所谓“国书”。这份文件最早是在1674年斯帕法里使团出使前夕被译成俄文的。其汉译本最早见于张星烺1930年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这份书信和顺治皇帝给巴伊科夫使团的蒙文国书，以及此后清朝皇帝委托其他俄国使者带回的国书相比显然很不正规，且文理逻辑都有不通顺之处。有学者即以此为重要理由，否认佩特林来华的可能性。笔者同样认为，佩特林带回的不可能是明朝的国书。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佩特林拿到的所谓国书可能不是真正的国书，但未尝不可能是朝贡贸易时携带来的敕文。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佩特林到达北京最大的可能性是加入了土默特人的朝贡队伍，以“进贡夷人”某某身份来到京师。既然如此，按照明朝朝贡贸易的一般法度，他更有可能收到的是敕书。但是，明朝敕书与国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获取方式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在《殊域周咨录》中，保存过总量不少的明代外交文书，从中我们对明代国书的特点可见端倪。这些文书不一定以“国书”名义出现，但是，它们所面对的一定是对象国家的君主或统治者，文字也多佞屈聱牙。在《明会典》中，也明确规定了外国使节如何正式求见明朝皇帝的流程。此项规定制于明初，并一直沿用到万历年。“洪武十八年定，蕃国初附遣使奉表进贡方物先于会同馆安歇，礼部以表副本奏之，仪礼司引蕃使习仪，择日朝见。”<sup>②</sup> 显然，这是一道颇为复杂的程序。到了明朝后期，随着外交政策的收缩，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不再像明初那样广泛去四方各国交往，而是发展出了一种限制外交的“祖训”观念。嘉靖朝主张禁海防倭的王希文在《重边防以苏民命疏》中就提出了“我祖宗立法，来有定期，周有定数，比对符验相同，乃为伴送。附搭货物，官给钞买，载在《祖训》可考也。”<sup>③</sup> 这种严格的制度起初主要是鉴别真伪，防范倭寇等外部敌对势力，发展到明代后来就成了阻碍同新国家交往的借口。嘉靖年间的巡抚都御史林富是主张弛海禁的开明官员，而他上疏弛禁时依旧坚持拒绝“佛郎机”入贡，

① 《明实录附录》：明熹宗宝训卷四·饬边防，天启四年五月丁巳条。

② [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五十八礼部十六，明万历内府刻本。

③ [明]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十六，明万历刻本。

理由是“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凡番舶之来，私自行商者尽皆逐去。其有朝贡表文出于《祖训》、《会典》所载众国，密调得真，许往广州洋澳驻歇。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sup>①</sup>

敕书的获取办法就轻松得多了。《四译馆增订馆则》中提到“鞞鞞馆除本馆职业外，又兼译女直来人进贡袭替来文并回赐敕书及译写顺义王表文”<sup>②</sup>。16世纪期间，西藏帕竹政权首领阐化王曾通过明朝官员郜光先为藏地僧人“代求进贡欲讨敕书”，理由是“近了朝廷地方仰慕皇帝爷爷，进贡求讨敕书”<sup>③</sup>。由此可见，明代颁发的敕书既可以通过外藩首领继承，也可以通过进贡求得。因此，佩特林若想取得敕书，大概是应该通过进贡求得的。

换言之，进贡和讨敕书容易，得见龙颜就难得多。拿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来论，他们直接入贡的梦想经历了重重波折，而内中最悲惨的莫过于成员纷纷庾死狱中的托梅·皮雷士使团。再以利玛竇为例，他的个人努力和造出的精妙机器虽然能打动万历皇帝，却也不能立刻起到外交作用。利玛竇本人在来到北京之后还是必须长期羁留于会同馆。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竇在内廷宦官马堂和左都御史曹于汴的帮助下才获准久居北京传习天主教，万历皇帝也为他发放俸禄。但是，即使如此，朝中仍有不少反对之声。礼部清吏司的态度就极为警觉，言“看得利马竇一寓夷耳，异物进献既非贡例，到京潜住尤涉诡秘”<sup>④</sup>。吏部右侍郎朱文恪也反对接纳利玛竇，直接道出“《会典》止有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驿，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给所进行李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竇冠带，速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支节，且使眩惑愚民。”<sup>⑤</sup>和利玛竇关系较好的蔡献臣针对这些人的态度，上《议处贡夷利玛竇疏》主张善待利玛竇，但他也承认“看得外夷之进贡也，必资国王表文。必由布政司起送。而其入都也，必扃之会同馆，必饬之光

① [明]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明万历刻本。在清朝张廷玉所撰殿本《明史》卷三百二十五中，林富上疏被加以篡改，变为主动提议允许佛郎机开市。关于这段历史真相，可参阅邓开颂：《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② [明] 吕维祺：《四译馆增订馆则·卷十二》，民国景明崇祯刻清康熙补刻增修后印本。

③ [明] 张鹗：《皇明嘉隆疏钞》，卷二十二，明万历刻本。

④ [明]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一，明崇祯刻本。

⑤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三十，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禄寺，必下臣部译审明白，而后疏进内府，必经鸿胪寺报名见朝，而后宴赏礼遣焉。此祖宗之定制，而礼官之职掌也”，只是念及“利玛窦以久住之夷，自行进贡，虽从无此例，而其跋涉之劳、芹曝之思，似不可不量加赏赉以酬远人。”<sup>①</sup>

我们再来看张星烺的汉译国书，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

“中国万历皇帝：有两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晓谕两罗斯人曰：为贸易而来，贸易可也，去后可再来。寰宇之内，尔大君主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两国之间道路颇为平坦。尔等上下沟通，可运来珍品，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今尔等即将归去，再来时，如系奉大君主之命，朕亟盼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报以国书。尔等如携国书，朕即命以上宾之礼接待来使。朕今不便遣使访尔大君主，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今致书大君主，并向尔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当遣使者前往。朕身为皇帝，依本国之习惯，既不便躬亲出国，亦不允本国使臣及商人出国。”<sup>②</sup>

这份“国书”中的不正常，在“敕书”恰好是正常的。“中国万历皇帝”<sup>③</sup>这个不甚通顺的词在边境少数民族的敕书中不算奇怪。洪武本《华夷译语》中不同的北元贵族对明廷使用的称谓就不统一。书信中说到的“有两人自罗斯而来”<sup>④</sup>，在国书中不可能出现，国书的指称对象只可能是对象国的君主，但在贸易敕书中“夷使”来历和数量则是必要的凭证。不仅如此，隆庆五年俺答封贡时王崇古上奏，建议“今宜定制岁许一贡，每贡俺答马十匹，夷使十人……其诸酋贡各以部落大小为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夷使各三人”<sup>⑤</sup>。这段内容在《明实录》则作“夷使各二人”<sup>⑥</sup>，故而佩特林使团允许入京进贡的队伍不会超过两三人而已，这和佩特林所携回书信中说的“有二人自罗斯来”就相符了。

又如，张星烺译文中提到的“寰宇之内，尔大君主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sup>⑦</sup>，大致相当于永乐本《华夷译语》中《敕谕四方海外诸国番王及头目人等》所言“凡覆载之间，日月所照之处”<sup>⑧</sup>。张星烺译文中“尔等上下沟通，可运来珍品，

① 《清白堂稿》，卷一。

②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52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五边典则》，卷十，旧钞本。

⑥ 《明实录》，穆宗朝卷五十四，隆庆五年二月庚子条。

⑦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第529页。

⑧ 乌云高娃：《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第187页。

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sup>①</sup>在永乐本《华夷译语》中《敕亦里把里地面火者、王、头目马哈木等书》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表述，“尔……遣使以阿鲁骨马<sup>②</sup>来进，诚意可嘉，特赐尔彩缎表里”<sup>③</sup>。

“今尔等即将归去”以后的部分很可能不是敕书的本文，而可能是礼部或会同馆官员附加的解释。佩特林到达北京之时，利玛窦已经去世八年，在他生前的努力之下北京已经有了信仰天主教或者同情理解西方人的官员士人。因此，也许不排除佩特林作为“夷使”入京后，有个别官员或中国基督徒和他有所交流，甚至可能在个人层面相信了他来自西方“罗斯”国的说法，故而出于好心在敕书之后添加附录，解释了当时中国外交形势，以便佩特林回国复命。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敕书何以得到。表面上看，明朝官员似乎断定了佩特林使团并未携带任何礼物。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佩特林一行同沿途蒙古各部又是怎么样拉近关系的呢？如果他使用贡使身份入关，他又怎么可能连马匹皮毛之类的普通物资都没有准备。作为俄罗斯国家派遣的使团，进贡一些简单的“方物”又有何难？明朝官员回绝的大概是他觐见万历皇帝的想法。虽然明朝来京朝贡者甚多，朝廷也会安排官员专门接待，但是，“夷人”要想朝见皇帝本人，那就非要出具正式表文，拿出点不一般的礼物，并且要打点好礼部官员才能引起皇上兴趣了。佩特林报告2号版本中明朝官员的一段话，注解了当时君臣的态度：“我们的皇帝不准备派使臣去见你们的沙皇，因为你们的沙皇有的宝物，我们的皇帝也有，我们皇帝有一块宝石日夜放光……”<sup>④</sup>。从这个角度看，也许不是佩特林真的两手空空，而是明朝人不大稀罕这些寻常贡物。这段明人的自夸也是符合万历时期历史状况的。明神宗对珠宝的喜好是出名的，殿本《明史》称“帝日黠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巨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sup>⑤</sup>。当然清朝官方或许对前朝有所丑化，不过明朝人或明朝遗民的记载中，万历皇帝的奢靡也是惊人的。谈迁《国榷》记载万历四年六月时，“承运库太监崔敏等，请采买金珠宝石以备大婚。”<sup>⑥</sup>万历十四年七月，《明实录》记载了南京官员孙世禎在全国范围的旱涝灾害面前的上疏呼吁，“近如承运库以买金珠宝石为请，用至十九万有奇，

①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第529页。

② 蒙古文 aruqu mori，指的是阿拉伯中亚一带的名马。

③ 《明四夷馆鞑鞞馆及〈华夷译语〉鞑鞞“来文”研究》，第189页。

④ 《在华俄国使者（1618~1658）》，第70~71页。

⑤ [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⑥ [清]谈迁：《国榷》，卷六十九，清钞本。

若少减数万，即可以为数千家中人之产，活书万垂死之命，不可量为裁减乎？”<sup>①</sup>可是到了当年九月时，“户部进金珠宝石杂料共费七万八千六百三十五金。”<sup>②</sup>一个西伯利亚哥萨克有能力进献的财物自然是难入万历皇帝法眼的。

因此，明朝方面很有可能就把佩特林当作塞北某个不知名小部落的头领，按“罗斯地方进贡头目”的名义给了敕书打发回去。再者说，即便他没有单独准备自己的贡物，只要他能够混入土默特人的队伍中，入关时就可以被计入“某某以下夷人多少多少名”之内。待朝廷接受了这支队伍的贡物后，作为朝贡队伍一员佩特林就有可能获得明朝人补发的敕书了。总之，从民族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报告文本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佩特林在北京的身份很可能是明人眼中某个“远方部落”的贡使，他带回的“书信”也很可能是一份“进贡夷人”的“敕书”。

## 五 对佩特林报告的历史命运与应有地位的重新评价

佩特林报告广受质疑的重要客观原因，是在他之后不久，内亚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佩特林出使时期一度雄踞阿尔泰山，扼守俄蒙之间要道的和托辉特部，在硕垒乌巴什 1623 年死后渐渐衰落，最终成为卫拉特和喀尔喀之间的弱小属部。曾经把持敕书，控制蒙古和重要通商要道的归化城土默特贵族亦在 1635 年被皇太极整肃，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大清王朝先后征服蒙古和入主中原后，佩特林的知识的即时性很快就失去了。何况直到 19 世纪后期，西欧人才得以踏足佩特林穿越蒙古高原的道路，报告中出现大量的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人名地名，对于西欧的知识群体来说也不异于天方夜谭。另外，佩特林有限的文化水平使他无法把自己的见闻和早期行纪联系起来，更无法对自己初步取得的知识进一步阐释。佩特林可能并不知道柏朗嘉宾等人在数百年前提到的“蒙古”和他接触到的“蒙古”有何种联系，也不清楚西欧知识界已经熟悉的马可·波罗等人。知识的局限影响了文本的跨文化阅读，也降低了行纪在同时代西欧人心目中的可信程度。将佩特林报告译成法文的东方学家贝热隆在 1634 年时，就这样总结道：“这些事情相当模糊和含混，另一些事情还有传说色彩。这个旅行家不能分清他看到的和他听闻的，这显示了他的无知。因此需要期待其他准确的行纪，因为它

<sup>①</sup> 《明实录》，神宗朝卷一百七十六，万历十四年七月戊申条。

<sup>②</sup> 《国榷》，卷七十三。

们会更加确凿。”<sup>①</sup>

但是，报告记载的与众不同，恰恰可以反证报告的材料没有经过后人的有意作伪。且不说蒙古高原上和托辉特部、扎萨克图汗部和土默特部三者 在 17 世纪初期同时兴盛的时期极其短暂。明朝九边的局势从 1571 年隆庆和议后的初步安宁，到 1592 年平定哱拜起事后大体和平，再到 1619 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的日益恶化，前后也不过几十年而已。佩特林笔下同时包括蒙古各部和明朝的太平景象只可能发生在 17 世纪初的十余年里。这位可能目不识丁的普通军人，焉能轻易编造出这段稍纵即逝的历史出来？

明朝和俄罗斯没有因为佩特林建立官方联系，这不能说不是历史的遗憾。这种遗憾和当时内亚的局势以及晚明的天朝上国心态不无关系。佩特林来华前，俄国人已和蒙古高原西北部的蒙古部落打了多年交道。即使佩特林不谙蒙语，使团中大略也必有了解蒙古语言的通事。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属于白海——波罗的海地域人种的俄罗斯人并不是典型的“高鼻深目”、“金发碧眼”型，他们发型多为直发，鼻子较短，鼻梁较凹<sup>②</sup>，有些像东方人脸型。同时历史上的蒙古各部也包括了不同族群和血统的人群。17 世纪蒙古文史书《黄金史纲》就明确记载了北元政治舞台上那些从名字上听就可能具有中亚血统的人，例如伊斯满、伯格呀逊、伊巴赉等<sup>③</sup>。在还没有什么“人种论”的 17 世纪，蒙古贵族和小头目中 出现一两个有西域相貌特征的人物，无论对于土默特部还是明朝来说都不算什么怪事。如此来看，佩特林一行很容易就会被明朝人当作蒙古人打发。另外，明朝人对于“罗斯”地方究竟在何处，本身就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关切。有明一代编绘的各种地图中，除了可能承袭了元代地图的《大明混一图》《輿地图》和《朔漠图》等对长城以外的地理状况等有较准确反映以外，其余地图对长城以外的状况都颇为无知。对于俄罗斯这个远在极北的国家，在明末即使是接受了西学的中国人也是不甚了解的。收于《三才图会》、较早受到西方地理学影响、画出五大洲的《山海輿地全图》中就根本没有俄罗斯的位置<sup>④</sup>。至于介绍俄罗斯的《职方外纪》，则在是佩特林使华以后才出版的。

不论如何，佩特林报告本身还是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前述若松宽提及的

① P. Bergeron. *Traite des Tartares*. Paris. 1634. p. 113.

② 朱泓：《体质人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0 页。

③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 89～94 页。

④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地理·一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原刊本。

佩特林对和托辉特部史事的纪存是一例。佩特林报告中列举蒙古高原各部时格外突出扎萨克图汗的地位，也是对当时历史形势的忠实纪录。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他对土默特部在朝贡贸易中的关键地位与其兴盛的佛教文化的描写。众所周知，有关河套地区土默特部的汉文史料大体集中在 1550 年庚戌之变与 1571 年隆庆和议之间，此后因其与明朝关系相对稳定，明人减少了对它的进一步关注，而蒙古文文献中对 16~17 世纪归化城地区的具体描写也不是很多。佩特林报告中关于当时归化城一带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藏传佛教兴盛程度的详细描写，恰恰可以弥补其他史料的空缺。

## 结 语

讨论俄国能否与万历年间的明朝建立官方往来，明神宗能否正式给阿列克谢沙皇颁发国书，以及那份“国书”的俄文译本像不像真正的国书，同讨论个别俄国人是否可能在内亚政治生态相对平静的 1618 年穿越蒙古高原到达北京，以远地“头目”某某身份随同蒙古人入贡，取得明廷一份朝贡敕书，实质上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前者是严格的外交史话题，而后者则是中西交通史或者说丝绸之路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在佩特林稍前与稍后，通过丝绸之路穿越欧亚大陆的商人和探险家不乏其人。比他稍早就有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河西走廊的鄂本笃，比他稍晚还有自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阿里的安德拉德。一个对西北蒙古诸部不无了解的俄国哥萨克军人，从地理上属于亚洲的托博尔斯克行进到长城脚下的北京，其实并非天方夜谭。若把中俄关系史的问题放在丝绸之路历史的大视角上看，或许学者们的思路可以更放得开些。

总之，佩特林的意义是不应被抹杀的。他是目前有文献可证的第一位来华俄国使者，更是自元明鼎革与金帐汗国瓦解之后，第一位成功穿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到达北京的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旅行家，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结束后第一位能够同时接触蒙古各部和中原王朝的人。值此佩特林来华 400 年之际，利用新方法和史料重新检视佩特林来华的真实性，不仅是为这位俄国使者正名，也是对中俄关系史早期发展基础的重新思考。

(责任编辑 张昊琦)